



# 海外佚存古籍的源流與學術價值

——兼談漢學研究中心所藏景照海外佚存古籍

## The Provenance and Scholarly Importance of Rare Chinese Texts Held in Foreign Collections

張 璉 (Rebecca Lien Chang)

漢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壹 ● 海外佚存古籍的流傳情形

自有文字紀錄以來，無論是人為的或自然的因素，隨著時間的消逝與朝代的遞嬗，許多文字載體在無法抗拒的情形下不斷的湮滅、失傳，後人在整理前人的智慧成果與文化遺產時，蒐羅散佚的文獻、古籍便極為重要。我國輯佚古書的工作源起甚早，歷朝歷代蒐求散佚文獻與古籍的情形皆可見諸史料，這些輯佚工作大多是以中國境內為蒐羅的範圍，然而自古以來因各樣管道流傳至海外的文獻古籍則不下千萬種，因此，歷代散佚海外的古籍也是不容忽視的輯佚方向。

中國古籍流傳海外可以說是遍及全世界，根據「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今「漢學研究中心」的前身）於民國 71 年（1982）編印出版的《海外漢學資源調查錄》的記載，目前世界上有三十多個國家的研究機構與圖書館有中文圖書的蒐藏，雖然這些藏書紀錄除古籍之外，還包括近現代文獻與出版品，但不難想像中國古籍散藏在海外的數量，遍佈於亞、歐、美、澳、非等

五大洲，其中以亞、歐、美三洲蒐藏的古籍最豐富也較具特色。亞洲地區以接鄰中國或鄰近的國家為主，這些國家因地理位置與文化因素，長久以來受到中國文化深遠的影響，中國古籍的傳入相當早。歐洲在中世紀時期由於中西交流逐漸頻繁，十六世紀後期開始翻譯中國經書，逐步展開漢學方面的研究，因此對於中文古籍的探輯自然是不遺餘力。美洲則以美國為主，對於中文書籍的蒐集則是十九世紀末以後的事。雖然歐美各國蒐集中國古籍發軔較晚，但蒐藏中文古籍之豐卻不容小覷。以下針對中文古籍傳佈於海外的情形，略述其歷史源流及現況。

#### 一、亞洲地區

長久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屬國或鄰邦，在北有日本、高麗，南有安南、琉球、菲律賓等，這些國家與中國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國的典籍很早便已傳入。

首先以北面的高麗與日本為例，有文獻記載顯示約在西元三世紀中國典籍已傳入高麗<sup>1</sup>與日本<sup>2</sup>，那時相當

1 蔣復璁，〈中韓書緣〉《中韓文化論集》，頁 275—294。

2 參見嚴紹巖，〈中國古代文獻典籍東傳日本考略〉（《古籍整理與研究》6 期，頁 255—276）徵引《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二書記載。



於中國南北朝時代，分別是高麗的三國時代與日本的奈良時代，但是若從中國與韓國、日本的歷史淵源來論可能就更早。到了唐代，由於大唐文化大放異彩，成爲中西各國遣使留學與爭相仿效的泱泱大國，高麗、日本等各國遣使至中國求書的例子，不僅中國的史書記載，也見諸於日本的文獻，例如日本江戶時代自長崎等海關流傳下來的《商船載來書目》或《唐船持渡商賣書物目錄》等書籍清冊，詳列當時中日貿易的漢籍圖書目錄，從其所列書目的種類，即可窺見當時中國書籍在海外買賣的頻繁<sup>3</sup>。兩宋以降，中國政府因爲政治因素的考量，對於書籍的賜贈鄰邦與對外貿易有所規範，制訂了書籍出口的相關法令，以管制書籍對外流傳的種類<sup>4</sup>，從一些事例可以說明當時中國書籍流傳數量之多與海外國家對中國書籍的需求情形。例如：宋眞宗時曾下令在北方書籍買賣必須在邊界指定的榷場內交易，並且除九經書疏外，其他書籍悉禁止輸出，雖然這個禁令是針對遼國而訂的，但當時宋與遼、高麗之間的國際關係微妙，因此對於書籍出口的禁令，高麗、西夏、交趾等的鄰近諸國也都受到限制；宋朝的文學家蘇軾也曾對於書籍大量流入高麗，而產生「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sup>5</sup>的隱憂，因此上奏分析書籍輸入高麗的諸多弊害等等。由這些史例來看，不難想見當時中國圖書出口，已發展到中國政府爲維護國家安全之計，必須立法限制書籍的對外流傳，然而這只是古籍流傳海外的一個掠影而已，許多藉由商船轉運、私人採輯或鄰國有計畫的蒐購而外流的書籍則不知幾何？二十世紀以後日本中國學（日人稱東洋學）興起，尤其二次大戰後中國學更是有系統的研究中國學術，都是據以往蒐藏豐富的中文古籍爲基礎。從今日韓國、日本各文庫、圖書館的漢籍目錄，或者私人編製的藏書目錄、佚存書目等，可看出千餘年來中國古籍散佚至海外的梗概。

歷史上稱爲「南洋」的東南亞地區，與中國文化交流也很久遠，早在漢代漢武帝在安南設立郡縣以來，中越關係未曾間斷，宋明時代政府經常賜贈書籍給鄰近的

屬國，如四書、五經、曆書等，東南亞地區則包括：安南（今越南）、暹羅（今泰國）、呂宋（今菲律賓）、琉球、真臘（柬埔寨）、婆羅洲等地。這些地區也常藉遣使入貢時向中國政府求書，如宋代安南王黎氏屢次遣使向宋朝求書，明代阮氏亦至中國購買曆書。在採輯中國書籍的同時，也將中國印刷術輸入自己國家，例如菲律賓在十六世紀開始採用中國的印刷術。此外，數百年來許多中國沿海居民或爲生活、或爲貿易而移居東南亞，歷經數十代仍維持中國的語言文字與傳統文化，因此中國書籍一直是東南亞華僑社會中極重要的典籍、文獻，諸如位於馬尼拉的「菲律賓華僑公共圖書館」（Philippine Chinese Public Library）的特藏中有清代版本的書籍便是顯例。

## 二、歐美地區

中古世紀中西方的交流並非完全空白，如景教的傳入、十字軍東征等，多少都已有所接觸，尤其後者對於尙處在所謂「黑暗時期」的西歐而言，受到中國文化的刺激並不小，不過中西雙方在文化上還稱不上有直接交互的關係；即使十三世紀義大利耶穌會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來，對中國有相當的了解，當時著名的傳教士如馬可波羅，他往返於亞歐兩地，讓西方人對中國產生更多的認識與憧憬，然而中西方卻仍未見實際的交流。直到十六世紀，歐洲經歷「文藝復興」而重整的新興國家，才逐漸主動展開對中國文化的探掘，那個時期歐洲作家筆下描述的中國，是個富庶而神祕的理想國度，無論是在風俗、文化、政教制度等等都與歐洲迥然不同，因而對中國產生濃厚的興趣，加上海權的擴張與貿易的需求，都帶動遙遠的歐洲各國來到東方，接著便是與中國持續了幾百年的密切關係。

西歐國家早期學習中國語文，除了爲傳播基督教義、貿易的往來發展和外交人才的培養之外，最大的目的是他們企圖對中國文化與學術做深入了解與研究。最初他們致力於中國經典的翻譯，例如《四書》在 1593 年

3 相關參考大庭脩著，《江戶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及吳哲夫著，《海外中國古代書蹟之探尋》，《第三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0，頁 123-144。

4 拙作，《宋明政府之域外賜書與書禁探研》，《第三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0，頁 145-160。

5 蘇軾，《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蘇軾文集》卷 35。



譯成拉丁文，十七世紀初陸續譯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英文<sup>6</sup>，十八世紀初法國法蘭西學院開設中文與滿文的特別獎座，不久又成立東方語文學院，是西方大學將「漢學」（Sinology）正式列入大學課程的開始。此後，歐洲隨著各國的需要與研究者的個人興趣，大學開設的課程逐漸增多，對於中國古籍蒐集更為殷切，流傳的管道除了傳教士、商旅或政府官員外，最重要的是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十九世紀初不少的歐洲考古學家到中國進行長期的調查與採輯，當中國政府與學術界尚無考古意識時，他們已經把中國幾千年來許多的歷史文物與考古文獻大搬遷了，如著名的考古學家有：英國的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與其他漢學家，自十九世紀初至清末從中國搬走不少寶物，諸如敦煌卷子、古印刷品及善本古書，許多都珍藏在今日歐洲的博物館與圖書館中。大體而言，歐洲國家東起英國、西班牙，西至俄羅斯；南起義大利，北至瑞典、丹麥都有中國古籍的蒐藏，其中又以英、法、德、義、荷等國較豐。

美洲地區中文書籍的蒐藏以美國為主，中南美洲如墨西哥、巴西、祕魯等國的幾所主要大學也有一些蒐藏。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始於十九世紀後半期，最初也是教會的發展與海上貿易的需要，而促進了美國與中國文化的交流。據《海外漢學資源調查錄》附錄資料所載，美國致力於東亞資料的蒐集至1960年代達到最高峯，中文藏書佔東亞藏書的百分之六十，其餘依序為日、韓、滿、蒙與藏文<sup>7</sup>，這個發展與六十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大學、研究機構與私人基金會開始資助從事亞洲與其他區域的研究趨勢有關。美國早期的中國研究受歐洲的影響，將「漢學研究」列為「東方研究」的重點之一，至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早期美國大學裡的漢學課程，多藉重歐洲的漢學家擔任，以及曾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來主持。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美國學界發展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就是對於世界各地進行區域性全面而整體的研究，研究內容結合了區域的歷史、人文地理、區域經濟、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元學科，因此美國的漢學研究走出傳統漢學的框架，不侷限

於經典的研究，範圍從人文的範疇跨越至社會科學，從古典研究發展至當代問題現況等多元化研究，為海外漢學走出更為寬廣的路線，傳統所稱的 Sinology（「漢學」）的意義已無法涵蓋，普遍以 Chinese Studies（「中國研究」或「中國學」）取代。以中文古籍藏書而論，美國國會圖書館最豐，如宋代至清初的善本有兩千種，中國方志三千七百餘種，約六萬冊，個人文集四千七百種，叢書三千種。美國許多大學都有中文古籍，其中以哈佛大學居冠，1928年哈大成立「哈佛燕京圖書館」，以蒐藏中國古典傳統文學、歷史、宗教見長，其中善本抄本有三萬冊以上，方志約三千五百種，叢書一千四百種。其他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都有極豐富的中文古籍。

### 三、其他地區

俄羅斯基本上應屬於歐洲地區，由於其地理位置特殊，與中國也有特別的歷史淵源，因此可以分開來談。自十七世紀西伯利亞納入沙俄版圖後，俄國開始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早期也有一些記載中國的自然、經濟、風俗與宗教的遊記，雖然十七世紀中葉沙俄政府首度遣使要求通商未成，但對中國進行天然形勢與風俗習慣調查得相當詳細，有助於俄國日後向外擴張的基礎。「漢學」（Kitaevdenie 或 Sinologiya）名稱的出現在十八世紀末，在漢學研究方面有貢獻的包括來往於中俄的使節、旅行者與漢學家。早期研究以古典文學、哲學與宗教為主，到蘇聯時期則分為新派與古典兩派，新派在莫斯科，以研究當時中國的科學問題與革命問題為主；古典派在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以研究語言學與文學為主。今日保存在俄羅斯的中文古書，有豐富的善本、抄本與文獻，具代表性的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圖書館」與該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在列寧格勒的分所圖書館、「莫斯科國立大學高爾基科學圖書館」、「俄羅斯國立外國文獻圖書館」等。

此外，位於南太平洋上的澳洲，因為開發較晚，大學的設立多是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中文書的蒐藏以現代出版品為主，僅有少數的中文古籍蒐藏於「國立圖書

6 錢存訓，〈歐美各國所藏中國古籍簡介〉，《圖書館學通訊》，1987.4，頁57—67。

7 參考《海外漢學資源調查錄》，臺北：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1982，頁438。



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該圖書館成立於1962年，蒐藏有宋代的版本，如宋「宣和博古圖錄」、五十九種明清版古典小說、六十餘種清版聖經譯本與太平天國史料等。

非洲在歷史上與中國的接觸不多，雖然宋明時代的海上貿易，中國商船曾經到過非洲西北角，但目前未見詳確的史料說明當時書籍的傳播情形。即便如此，創立於1829年的南非開普敦大學圖書館，卻有三百冊的中文書籍，這批中文書原是Allan Gossop的私人舊藏，他曾上海居住十五年，因個人偏好而蒐藏中文書，此外，還有不少旅行者與傳教士所寫有關1872年以後英國在中國大陸見聞的西文書<sup>8</sup>。

## 貳 ● 漢學研究中心景照佚存古籍之史料價值

漢學研究中心設立於民國70年(1981)，由教育部指示當時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即現今的國家圖書館兼辦主持，至今已十八年。漢學研究中心設立的宗旨，以推動海外漢學研究與加強漢學資源為主要目標，成立之初即鑑於研究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的領域中，歷代文獻與古籍是最重要的資源，但因種種因素造成我國歷代許多珍籍散佚海外，倘要能充實臺灣地區的漢學資源，及加強研究環境，必須進行海外佚籍調查與蒐集，因此海外輯佚便成為漢學研究中心的重點工作，舉凡臺灣地區公藏善本中闕遺或殘存不全的版本，以及罕見的善本等，都是主要蒐羅之列。由於散佚海外的古籍數量極多，種類龐雜，蒐藏地點也很分散，因此漢學研究中心在規劃上採取階段性的做法，優先以臺灣地區所藏已稍具特色的古籍優先進行補缺，使其更為完備，此項工作自本中心成立至民國78年(1989)止皆有固定經費支持，輯佚工作進行尚稱順利，八年間的蒐輯已粗具一點基礎，78年以後因經費緊縮，此工作只得暫時擱置。

漢學研究中心輯佚方向，基本上建立在臺灣地區的兩大典藏基礎上，一為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一為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這兩大典藏皆為歷代的精善之本。國家圖書館所藏為民國

38年多由南京中央圖書館遷移至臺北，包括宋刊本201部、元刊本230部、明刊本6,219部、清刊本344部等等，約五千餘種十二萬餘冊。「北平圖書館」藏書是原「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於民國30年(1941)二次大戰期間與美方接洽而運往美國，暫時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民國54年(1965)袁同禮在美病故，臺灣方面與美國交涉而轉運至臺，同年底教育部撥交國立中央圖書館代管，今寄存於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這批藏書近三千種二萬餘冊。本中心輯佚古籍的主要來源，先從鄰近藏有豐富古籍的日本著手，其次兼及美、英等地，典藏單位包括：日本的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英國的劍橋大學圖書館、倫敦大學圖書館、里茲大學圖書館；烏拉圭共和國國立圖書館，也有少部份是北京圖書館的宋元善本微捲及天一閣影印古籍。以上所蒐集的海外輯佚古籍，涵蓋經、史、子、集四部，計經部211種，包括易類、書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四書類、爾雅類、小學類、彙編類等，其中以四書類為最多；史部381種，包括紀傳類、編年類、別史類、雜史類、傳記類、外國史類、地理類、政書類等，其中以地理類較豐富；子部34種，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醫家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小說家類、道家類等；集部335種，包括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等，其中以明代別集最具特色，總計四部凡960種。基本上，臺灣地區善本古籍以「明清方志」與「明人文集」兩大類較具特色，本中心乃以加強這兩部分為階段性的目標，至今已採輯「明清方志」(史部地理類)303種，「明人文集」(集部別集類)277種，以上近六百種的海外佚籍使臺灣地區原有的收藏更加充實完備，相對也提高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價值。民國79年漢學研究中心據傳統四部分類法編製一部書目——《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書目初編》<sup>9</sup>，供學界查檢參考。由於早期兩岸尚未開放交流，大陸方面資訊管道亦不暢通，因此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中，有些大陸地區重要圖書館或已藏有原本，今日兩岸學術與資訊雖已交流頻繁，但就加強臺灣地區學術環

8 同註7，頁141。

9 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編，《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書目初編》，漢學研究中心出版，1990。



境需求與便利而言，重覆蒐藏仍有其相當的學術價值。

## 一、史部——明清方志（303種）

「明清方志」的輯佚工作，主要根據國家圖書館民國56年（1967）出版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版）地理類（僅以總志、都會郡縣、邊防等項為主）統計<sup>10</sup>，共有632種，其中包含「北平圖書館」（據同年出版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統計）所藏394種。在632種方志中以明代刊本的方志居最多，清代為次。漢學研究中心乃依據上述的書目資料為基礎進行輯佚，目前「明清方志」的景照古籍計303種，倘除去其中天一閣影印出版的方志（93種）與少部份「北平圖書館」微捲（3種）則為207種。今再對照大陸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其中與大陸典藏相同的版本有100種，因此其餘107種則為兩岸之外真正的海外佚籍，這些皆是採輯自日本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及國會圖書館，以明代方志為主體，清代方志則至康熙朝為止。方志的編製多在府州縣的官方組織下編纂而成，資料較為完備，少部份也有個人成書，所載內容包羅甚廣，大體有疆域圖、建置沿革、職官表、學校、仕績、儒林、忠節、文苑、藝文、風俗、物產等項，是考察歷史中人、事、時、地、物不可或缺的史料。

## 二、集部——明人文集（277種）

臺灣地區蒐藏歷代古籍中以明代的資料最豐，如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明代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明代戲曲等，皆是研究明代歷史與文學相當重要的材料。依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集部別集類「明人文集」多達2,122種，其中包括「北平圖書館」的672種。日本蒐藏的「明人文集」可稱是海外佚存古籍中之大宗，根據日本學者山根幸夫教授主編《（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sup>11</sup>統計有五千餘種，收錄的文庫、圖書館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

所、宮內廳書陵部、內閣文庫、國會圖書館等十個單位。該目錄除了收錄明、清版本外，其他如近代石印本、影印本、日本刊本、寫本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庫珍本和「北平圖書館」微捲也都包含其中，倘若除去非明清原版，則實際數量應減至三千餘種，不過數量仍相當可觀。漢學研究中心進行海外「明人文集」的輯佚工作，主要集中於典藏較豐富的內閣文庫與尊經閣文庫，目前總計採輯277種。

明代文集數量龐大，係有其歷史背景。大體自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印刷事業的普及，以及學術文風走向平民化、個人意識逐漸抬頭等種種因素，皆促使讀書人出版個人文集大為風行，因此自嘉、萬至明末清初，文集的刊印宛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明人文集」涵蓋了社會各階層者的作品，例如許多是著名的士大夫、思想家、文學家的作品，卻也不乏未取功名、不見經傳的處士、布衣之作，從各種階層文人的作品中，可充份反映出明代中葉以後的社會發展趨向。個人文集的刊印，有些是作者晚年時將一生作品編輯成書，有些是後代子孫或學生蒐集前人之作編輯而成。文集內容類別繁多，諸如在為政方面有奏疏、策、啓等，可反映當時士大夫從政的態度與時政的針貶；在詩文方面有詩、賦、散文等，特別晚明掀起復古之風，古樂府、律詩、絕句之作不少，個人的情感與時代思潮皆從詩文中表露無遺；在社會交游方面有題記、書信、祭文、墓誌銘等，傳達出作者對社會的關懷與交游情形。

茲舉明末遺民陳禮永作品《水鏡集》（清康熙年間鍾德堂刊本）為例，此文集為江戶時代流傳入日本，歷經「佐伯文庫」、「淺草文庫」等五個文庫的輾轉收藏，現存藏於「內閣文庫」<sup>12</sup>。《水鏡集》作者為江浙地區一名未成氣候的小家，晚年輯平生之作而成，刊印目的不外是流傳鄉里及後代誌念，故刊印數量並不多，若非經本中心蒐輯海外散佚古籍，該書恐無緣為後人窺知。《水鏡集》雖為一普通之作，但詳細分析研究其內容後，發現該書頗能反映明末清初的社會狀態與歷史轉折。作者處於晚明時局動蕩、民族意識高漲的時代，當時不少

10 史部地理類子目種類甚多，本中心僅以總志、都會郡縣、邊防三種為主要蒐集的範圍。

11 山根幸夫編，《（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東京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發行，1978。

12 參考拙作《〈水鏡集〉研究》，《第七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95，頁195-209。

文人棄文從武，多在失敗後遁隱山林，有些則積極出任清朝地方官，為鄉里百姓盡一己之力再退隱，而陳禔永既未參軍從戎，也無出仕鄉里，然而從他少年喜好悠遊詩賦，中年感時憂國、落拓失意，晚歲自憐自艾，明末遺民的性格在《水鏡集》中表露無遺。從該文集中可掌握三個歷史素材，其一為反映明末政局動亂與社會互動關係；其次為從其古文詩賦的作品，顯示晚明擬古文潮的影響；再者為反映作者面臨時代變動時個人內心世界的轉折。以上所舉僅是眾多文集中的一例，其他各種文集皆各有偏重與特色，舉凡民間社會、經濟發展、海上貿易、西北邊防或東南海上活動等等，皆可自明人文集中尋找到相關重要線索，是研究明代史不可或缺的資料，學術價值自不在話下。

此外，漢學研究中心在「明代奏議」方面亦有些採輯，種類不多凡僅 22 種，雖然奏議在《歷代名臣奏議》或明、清《經世文編》等書已收錄不少，但仍有闕如。奏議內容包括奏、議、疏、劄子、封事、彈章、對策等等，是歷代文武百官從政時所提，對於研究當代政治的型態、制度形成與運作、時政的建議與關切等皆為重要史料。

### 叁 ● 整理海外佚籍的建議與展望

各國收藏我國歷代的古籍，無論當時是以何種方式或手段取得，早已成為各國的特藏與財產，我們今日若想取得這些歷代珍籍，不外以影印、照相、縮微（microforms）或電腦掃描的方式購得。漢學研究中心為長久典藏考量，輯佚古籍並未採用影印或縮微方式，由於影印易因時間長久而消失，縮微則須透過閱讀機才能閱讀，在視覺上不盡如人意，故採輯日本佚存古籍的作法，係透過日本「高橋寫真公司」以照相翻拍方式複製，該公司採用厚薄仿如 90 磅道林紙的特製相紙，將古書逐葉翻拍，本中心再以精裝燙金裝訂成冊，因此每部景照古籍皆所費不貲。目前本中心因經費受限，輯佚工作已停頓多年甚是可惜。多年來從事此項工作的體驗，深覺還有許多可開展的工作，但必須結合有此共識的單位，羣策羣力共同努力。茲綜合整理幾點粗淺的建議，以供諸家參考。

### 一、編製《中國海外佚存古籍總目》

應全面調查世界各國海外佚存古籍現況，按經、史、子、集四部編訂海外佚存古籍書目。海外典藏中國古籍的圖書館，雖然一些著名且較具規模的圖書館已有書目可循，但有不少國家的圖書館因缺乏專人整理，筆者憶及數年前至美國洛杉磯承辦「美國亞洲學會」事宜，並走訪近郊 Clemont Colleges，該校其中一學院圖書館即存藏明清版本數十冊，該館雖無專業人員處理這批古籍，卻仍以珍貴骨董視之，故典藏尚稱完好。不容否認的，許多地區因為語言文字的障礙、缺乏專業人才，致散佚海外古籍長久堆置荒廢殊為可惜，倘能與這些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並結合兩岸古籍整理專業人才，有計畫的以交流互惠方式，分別至世界各相關圖書館整理古籍編目，然後匯輯各圖書館所藏，編製《中國海外佚存古籍總目》，掌握了佚存各國的古籍存藏情形，才能確實推展海外輯佚工作。

### 二、將「紙本古籍」轉成「電子古籍」與「古籍數位化」

與各國圖書館進行合作古籍整理，最好同時將經眼的古籍予以複製，採傳統照相縮微或複印的作法，已無法滿足現代電子資訊的管理與傳播方式，最佳的方式是運用現代先進的科技，以電腦全文掃描方式一頁頁將古籍掃描進入光碟，不僅保留古籍全貌，並可儲存大量古籍，使傳統「紙本古籍」成為「電子古籍」，即使電腦掃描設備價格昂貴，也必須有數部機器在各地同時進行，才可快速收效，因為未來各圖書館閱覽古籍將產生變革，便是不再以原件紙本古籍為訴求，而是以古籍本身的內涵才是主要的研究目標，因此凡可反應古籍文本的載體，都將取代傳統的原版紙本。此外，要便於古籍文本的檢索，必須進行古籍全文輸入電腦，目前國內已有一些研究單位或個人的成果問世，如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等，也有一些學者研發中文古籍輸入電腦的相關技術，如「臺大電子圖書館與博物館計畫」已見到專業的資訊工程界學者專家投入心力，為解決史料、文獻數位化而努力，已是明顯的趨勢。「古籍數位化」以後，許多文獻、史料等古籍資料等，可為學界提供更為靈活的檢索與利用，對於學術研究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過去二十年間，日本在中國古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我們參考。茲自 1966—1986 年日本文部省審定「日本中國學會」申報的「中國古籍整理與研究項目」，即撥款資助中國古籍整理與研究，經費從第一年的 799 萬圓日幣遞增至 1985 年的 3 千 320 萬圓日幣，從此影響了日本中國學的研究方向<sup>13</sup>。從日本政府核撥龐大充裕的經費，逐年整理中國古籍與專題研究的例子，實讓我們汗顏。在即將跨入廿一世紀的今天，回顧十七、八世紀以前散佚海外的無數珍籍，逐漸為世人所遺忘，甚至任其湮沒朽壞，而我們對所能做的卻如此的有限，怎不令人憂心？我們應當努力爭取政府教科文經費的大力支援，結合羣力推動具體「搶救海外佚籍」的方案，才能真正收立竿見影之效。

### 三、結合輯佚古籍與現存古籍進行專題整理與研究

輯佚海外古籍僅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之一環，主要是以補充國內原有現存古籍為目標，因此海外佚輯應與現存古籍相結合，並可依古籍特色進行專題整理與研究。本中心在此前景之下於去（民 87）年中即著手規畫以明人文集為專題的整理計畫，去年底正式展開「明人文集聯合目錄資料庫」的建置，目前以國內典藏為主，包括國家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故宮博物

院文獻處、臺大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等蒐藏，加上本中心多年來輯佚的海外明人文集，總計近三千種，此資料庫不僅為一聯合性書目，最大特色是建置各文集的卷次與篇目，使每部文集所涵括的內容皆可通過電腦呈現出來，同時在資料庫中出現的人名採超連結方式（hyper-link）可串連起來檢索，此外，也提供作者小傳、字號別名及中西曆年代對照表等輔助性工具，預計三年完成。依據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的整理統計，大陸現存的明人文集約有二千餘種，日本山根幸夫《（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統計有三千餘種，可見存世的明人文集相當豐富，本中心建置「明人文集聯合目錄資料庫」，目前僅只是個開端而已，爾後將匯合大陸現存的明人文集及海外佚存古籍，尤其以東亞地區為優先進行，此項計畫倘能完成，相信應可為學術界提供許多未問世的研究材料，並進而提昇此範疇的研究成果。輯佚古籍與現存古籍結合整理，除本中心目前所進行之專題外，還可根據古籍的不同特色訂定不同專題整理，以階段性的規畫一步步來落實古籍整理工作。

以上僅為個人工作上的心得與淺見，期望關切中國古籍的學術單位或研究團體，提出更具體的整理與研究方案，結合各方專業人才的智慧與心力，攜手合作為延續祖先珍貴典籍、保存中華民族遺產而努力。

13 參考斯硯編譯，〈日本文部省 1966—1985 年對中國古籍整理與研究撥款項目總匯〉，《古籍整理與研究》6 期，頁 253—274。

## 漢學研究通訊

贈閱對象為：海內外漢學學術機構、學校或團體；個人限助教授或助研究員以上者。

凡索贈本刊之學者請書明姓名、學歷、所屬機構或學校、研究主題、已出版之主要論文或著作等項，寄臺北市 10001 中山南路 20 號「漢學研究通訊編輯部」收。

已受贈本刊學者，如收受地址變更，請通知本刊。